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政治学（第一辑）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政治中之人性

[英] 倭拉士(G. Wallas) 著 钟建茵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 政治学（第一辑）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政治中之人性

〔英〕倭拉士（G. Wallas）著 钟建因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中之人性/(英) 倭拉士 (Wallas, G.) 著; 钟建阁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政治学)

ISBN 978-7-5520-1244-6

I. ①政… II. ①倭… ②钟… III. ①资产阶级政治学 IV. ①D0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1960号

政治中之人性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0-1244-6/D.364

定 价: 80.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文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续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英] 倭拉士 (G. Wallas) 著 鐘建閔 譯

政治中之人性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初版

譯例

(一) 此書爲英儒格拉士 Graham Wallas 著。原名爲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以其尚不繁冗，故譯成今名。氏爲英國名教授，所著尚有 Great Society 一書，經梁啓勳先生譯成，名爲社會心理的分析（商務版）皆氏極矜慎得意之作。自謂此書爲反對智力說，而 Great Society 則又矯反對者之枉，比而觀之，相得益彰。好學深思之士，不妨互相參照，以窮其說也。

(二) 原文極矯健曲折之致。惟有時用意過深，反失沉晦。糾繚迂繞，不易猝明。本書按字對譯，不輕動移。藉此存真，亦以略窺西文風格。文以盡物，理待推求。弊病削趾，不願還珠。調劑此間，頗嘗甘苦。至於原書徵引，均有所本。隨手翻遂，不加疏解。蓋在通習西文者，取觀便審。（如柏拉圖之烏托邦、嘉萊爾之英雄等，稍解英文者，類皆知之。）否則雖連篇累牘，亦不易遽畢其辭。今日學子，既與嚴復時代有殊，固無事顛倒損益，爲之達情矣。

(三) 嘗謂西文亦頗有其佳處。玄名豐麗，意無不宜，一也。名理精確，語無遊移，二也。

句有包孕、極便伸縮、三也。審衡多寡、詞有分量、四也。假有雄於文章之豪俊、擷取羣言、羅網名著、循辭切意、無背原文、以彼諦審綿密之章、運吾淵雅雋永之格、則寧獨理指宏深、足以益人神智、卽文言變革、亦當闢其先河。世有斯人、執鞭忻慕、譯餘贅此、以待知言。

(一) 本書有全書要畧 *of Synopsis*、提綱挈領、極便參證。是亦西人著書之一善法也、因並譯之。

(二) 譯者筆力薄弱、至不足道。且成書急促、尤恐紕謬叢生。世有高賢、幸董理而誘進之。

民國十二年十一月譯者識

目次

緒論	一
第一部 本問題之概況	一七
第一章 政治中之衝動與本能	一七
第二章 政治之體質	四七
第三章 政治中非理之推斷	七八
第四章 政論之取材	八九
第五章 政治上推論之方法	一〇七
第二部 進步之可能	一二九
第一章 政治道德	一二九
第二章 代議政體	一五一
第三章 官吏思想	一七八

第四章 國家與人類……………一九八

附全書提要……………二二一

政治中之人性

緒論

今日之研究政治，蓋猶在偏缺不全之中也。（指一九〇八年）昔之劇爭，在何種政體爲最適宜，相持既久，則似羣以代議民治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爲最高矣。四十年以前，若有人謂以近代大國之主權，乃植基於廣大無垠之選舉上，此其事蓋未嘗有成者。（最少亦指在歐洲）則必辯論紛呶，莫衷一是。英倫當一八六七年時，脫離黑闇，重覩光明，而是時在歐洲論代議民治者，乃首推此國。然在今日則以國會民主制 *Parliamentary republic* 而用普遍選舉 *Universal suffrage* 者，此在法蘭西既優爲之矣。反抗極微，未嘗遽遜三島也。卽橫絕一世之德皇，在一九〇七年選舉以後，乃自稱爲國人所公推，而非出自神權之遺襲。泱泱大邦，若俄羅斯者，亦欲以其主權寓諸國會而向稱頑梗之都馬 *Duma* 俄國國會 日爲情勢所迫，駸駸然且握大權焉。教皇者，向以神權治世者也。然在今日，卽最崇奉教皇之天主教徒，亦以其皇爲不可不具有人世帝王之

權。非以其爲人世政治中意構之美境也。特謂在教會中。其各人既皆爲各立憲國中具有選權之公民。則會中董事人員。在茲意大利片土之中。亦不可無動作之自由。因利乘便。舍是亦無他途耳。主張不用代議之民治者。在十九世紀時。有共產黨之運動。有虛無黨之運動。然人聽之者蓋寡。而其自身亦未嘗有建設之計畫也。即在今日。欲以社會改革而均配近代科學之工業者。亦欲以選舉之權付諸工人階級之中。則代議政治之深入人心。亦約略可觀矣。

然即以最容納代議民治之國家。嚮往頃注。而莫能自己者。其中政客政家。經驗既久。反覺迷眩罔適。而嗒然若喪。美利堅之合衆國者。試之最久。而未嘗有間斷者也。其國之憲法行之一百二十餘年。其間因解釋細節之故。常起紛呶。甚且因是激起戰爭。然實際上則未嘗發生疑問。即至今亦並未發生疑問也。然以英倫遊客之所考察。則所謂選舉之機械 *Electorat machine* 者。雖在聯邦政治。以及各省市政治中。繼長增高。方興未艾。而美洲人士則未嘗爲之躊躇滿志也。

若就英倫言之。則吾人對於代議民治之經驗。不獨遠遜於美洲。即此推行民治制

度之時。吾人政治上之遺孽。乃反橫梗其間。使吾人不能完全容納民治之意念。第其中雖有程度與情勢之差別。然觀察英倫者。將見其中忠於民治之人。若躬歷選舉團體之細務時。亦必嗒然若喪。以視美利堅。初無二致也。不佞亦嘗奔走於國會選舉之競爭矣。且嘗五度爲倫敦市政選舉之候選人矣。尙憶最後一次時。有助吾求票者二人。方劇談一日間之所事時。乃竟公然曰。異哉。今日之所事也。其實此語亦不僅見諸私人燕居之餘。即在英倫以政治爲業之人。其成敗端視選舉之鑒別者。亦常出此言而不佞常親聞之者也。日耳曼與意大利之選政若何。不佞若無頭手之智識。惟一年前。不佞與巴黎市政公所之東道宴談時。頗覺關於民治選制之推行。其人之所表示。一若甫脫幻迷。而重覩真象者。其愉快之情。尙令人迴憶不置也。

再就英美兩國言之。今日所以紛擾一世之問題。其翹造之者。乃社會上方興之勢力。非將亡之勢力。此人人所能覺察者也。在美國中所謂機械者。於各大都會中。其戶口、財富、能力。足以代表美洲文明之所求者。則其流弊最著。若在英倫則吾人試放眼一觀。舊日產魚最富之各港中。賄賂公行。橫絕一世者。或教堂林立之區。向傳穢德彰聞。爲日